第 62 卷 第 3 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62, No.3
2025 年 5 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May 2025

# 从评价腓尼基人的历史地位看超越西方中心论叙事结构

韩　震

(北京师范大学 哲学学院, 北京 100875)

**摘　要:** 所谓西方中心论的叙事结构,东方(也就是西方之外的世界)与西方的关系实质上是作为相对性、特殊性、偶然性的“多”与作为绝对性、普遍性、必然性的“一”的二元对峙,引申出来的意思就是西方是文明,而东方或除西方之外的其他世界均是野蛮半野蛮(或者说是未开化或半开化)。因此,东方其他民族的文明只能是西方的参照,而不是西方学习的对象。从学术界评价非欧洲民族如腓尼基人的历史地位,我们能够理解:如果不跳出这种叙事结构,我们往往在无意识之中就不断复制西方中心论的观念。本文力图抗辩一种认为腓尼基人不能被认作是古希腊人老师的观点。

**关键词:** 古典文明;腓尼基人;希腊人;地中海文明;文明互鉴

**中图分类号:** B 5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25)03-0077-07

## 一

根据古典学的资料可以发现,古希腊罗马古典文明是在承接两河流域及埃及文明成果之上发展起来的、是在西亚北非文明基础上崛起的,因此,西方的所谓古典文明与东方文明有着紧密的联系。古代希腊、罗马人并不否认自己受惠于东方,甚至反而特别强调与东方之间的文化联系,如希腊神话中的“欧罗巴”来自黎凡特,而罗马人则认为自己是小亚细亚特洛伊人的后裔。

但是,伴随着欧洲近代以来的崛起,西欧人越来越有意识地割断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与西亚北非之间的联系,试图塑造一种从古典到现代的一以贯之的“欧洲特性”,并且将这种特性与东方(或世界其他部分)对峙起来,以论证东方或世界其他部分都是作为“多”的相对性、特殊性、偶然性,而欧洲文明方是作为“一”的绝对性、普遍性、必然性。① 现代化道路只能走西方的道路,这种观点就是西方中心论叙事结构的最新表现。在塑造“欧洲特性”的神话中,西方哲学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与之相关的就是哲学史的叙事结构。从黑格尔开始,东方思想都被清除出哲学的神圣殿堂,希腊成为欧洲哲学一以贯之的唯一“故乡”。黑格尔认为,他有责任否定“一个很流行的传说”,即“毕泰戈拉的哲学是从印度和埃及传授过来的。这些民族的智慧是有古老声誉的,而这智慧据了解是包括有哲学在内的”,还有“在罗马帝国时期浸透了西方的东方思想和宗教仪式也得到东方哲学的名称”。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不符合哲学本身的规定性的。“思想的自由是哲学和哲学史起始的条件”,而既然东方人没有自由意志和自由思想,“所以这种东方的思想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以外”。黑格尔由此得出结论说“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惟有在西方这里自我意识的自由才首先得到发展……在东方的黎明里,个体性消失了,光明在西方才首

**收稿日期:** 2025-04-07

**作者简介:** 韩震,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① 参见韩震:《古希腊罗马文明的地中海文明属性——关于欧洲文明连续性神话的审视》,《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10期,第59—76页。

先达到灿烂的思想,思想在自身内发光,从思想出发开创它自己的世界。”而西方哲学发展的全部线索就是: “……凡是满足我们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都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传来的,——间接地绕道通过罗马。”①19 世纪德国黑格尔主义者策勒,在贯彻西方中心论叙事逻辑的时候,比黑格尔还要彻底。他断定 “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能比希腊人更公正地评价自己的天性和组织制度、道德和习俗。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能以比他们更清澈的眼光去看周围的世界,去凝视宇宙的深处。”②“哲学概念,特别是在哲学的童年,是同它们的语言表达紧密结合的,而且对外族语言的知识在古希腊人中间应该很少被碰到。”③因此,在其著作中,策勒用了很大篇幅论证希腊哲学不可能有东方的思想资源,不可能从东方学习到哲学上的观念。借着哲学 “普遍性”外衣的加持,欧洲作为普遍性的 “一”与东方或者是西方之外的其他世界作为 “多”就形成一种二元对峙的叙事结构。后来的西方哲学家无论对黑格尔哲学怎样评价,但关于哲学发展史的叙事结构基本形成,且从未发生过真正的动摇。即哲学概念发展的理论和历史逻辑,都是从希腊开始的,经过以罗马教会为标志的中世纪神学遮蔽,在笛卡尔那里重新获得发展的动力,并且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实现了其完美的体系。一部哲学史就是从希腊到日耳曼的思想史,其余的民族都被排除在哲学之外,或者说在哲学上都是缺失世界历史意义的民族,而其中希腊哲学从实质上看也无非是为了日耳曼精神的实现而准备的逻辑起点而已。

随着考古学的发现,近些年来,历史学界已经开始对这种欧洲( 或西方) 中心论进行反思和重构,意图尽可能真实地再现历史真相。但是,哲学领域似乎仍然固守着西方中心论的圭臬不变,甚至还有变本加厉之嫌,认为欧洲或者西方才有对真理的绝对探索即 “真正的哲学”,从而系统性地否定其他民族哲学存在的 “合法性”。这种认知叙事的逻辑不仅影响着学习哲学专业的学生的世界观和历史观,而且也会影响其他学科的学者看待人类文明史的视野。如果不跳出西方 “东-西”二元对峙的叙事结构,我们就往往无意识地复制西方中心论的观念。

按照西方叙事结构编写的哲学史,往往让学习过哲学的学生无意识之中就习惯于将从希腊到黑格尔看作是欧洲人连续的思想发展过程。然而,真的还原到古典文明的时代,真实的思想发展图景可能大不一样。如果从大历史观和更广阔的空间角度看,在古代很长时间内,古希腊、罗马文明实际上明显是环地中海文明的组成部分,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地中海文明绵延发展的产物; 而西欧即法国、荷兰、英国、德国这些地方的文化与古代的希腊、罗马存在着巨大的文化断裂。基于这一点,地中海文明前期文化思想的发展应该是希腊哲学产生的精神资源。离开地中海文明,就很难理解古希腊哲学的起源和发展,甚至很多在欧洲耳熟能详的哲学家,早年都有在西亚北非生活的经历,如德尔图良、奥古斯丁,等等。实际上,近代欧洲哲学,是通过阿拉伯人找到了古典文明的经典,在这个基础上阐发了一种适合现代性的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古希腊就没有后来的近现代西方哲学。但是,古希腊人讲的哲学,在当时是地中海文明发展的高峰,绝对不是飞来峰,更不是为后来欧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体系作思想和逻辑环节上的准备。古希腊哲学有西亚北非文明发展的成果作为思想前提,如果没有西亚北非文明宗教、艺术等发展成就作为思想前提,古希腊哲学也是不可想象的。

## 二

在当今中国,随着民族复兴和文化自信的确立,以文明平等交流取代文明优越论,以文明有益互鉴取代文明冲突论,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主流,但西方叙事结构给我们制造了许多话语陷阱,一不小心依然有可能落入其中。譬如,青年学者李永斌教授的《希腊与东方》一书,在论证希腊与东方的关联时,

---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1 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64、93、98、157 页。

② 策勒:《古希腊哲学史纲》,翁绍军译,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3 页。

③ 爱德华·策勒:《古希腊哲学史》第 1 卷上册,聂敏里等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33 页。

进行了非常扎实的论证。但是,当谈到希腊文字是在腓尼基字母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史学界有"腓尼基人是希腊人的老师"的说法时,他对这个说法就产生犹豫。李永斌认为,这"需要打一个问号",理由是: 尽管"希腊人在古风时代以后所使用的字母文字,确实来源于腓尼基人","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关于腓尼基人对古风时代早期希腊人历史发展的影响,我们也不能过高估计和评价。腓尼基人是一个相对松散的民族,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不仅没有稳定的领土,而且没有足够的族群认同感; 他们的商贸和殖民活动很大程度上是追求物质利益; 他们自己在文化上也缺少创造性"①。尽管我对李永斌的学识非常欣赏,并且对他的学术研究给予支持,但是我不同意李永斌对腓尼基人历史作用的这种判断,我觉得可能是他对希腊文化发展高度的歆羡影响到对历史事实的判断,同时因为受到西方古典学的羁绊,一不小心就落入了西方叙事结构的陷阱之中。我个人认为,在资料有限的情况下,不宜轻易否定"腓尼基人是希腊人的老师"的说法,从而抹杀腓尼基人对地中海文明的贡献。

第一,我承认古希腊人文化发展高度无疑是超越腓尼基人的,但这不影响"腓尼基人是希腊人的老师"的结论。正像现在许多泰斗级著名学者、科学家也有中小学时期的老师一样,他们的老师可能没有做出著名学者和科学家那样的成就,但曾经是这些杰出人物的老师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不愿承认腓尼基人是希腊人的老师,这是黑格尔及其继承者策勒等人坚持认为西方人不可能以东方人为师观点的某种延续。按照西方人的逻辑,东方只是西方的参照,不可能成为西方的老师。问题在于,这种观点为什么能够延续?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西方历史观的叙事结构在无意识之中仍然起作用。

第二,"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这本身是地中海文明许多民族的文化特点,他们更多是建立城邦式国家,例如,在整个公元前三千年,美索不达米亚分布着无数个城邦小政治单位,每个城邦以城市为中心,在周围的土地上耕作。"在美索不达米亚人的宇宙观中,城邦的形式是原始民主制,在其文明诞生的时代,这似乎已成为城邦的普遍形式。"②无论是城邦还是民主制,这与希腊人倒是非常一致,一味地断定民主制是希腊人的专利,显然也是西方的话术而已。另外,当时的希腊人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反而是作为希腊外围的马其顿人构建了横跨亚非欧的大帝国,大家知道许多当时的希腊人不认为马其顿人是真正的希腊人。我们不能在论证希腊人崇尚自由时,认为希腊人没有统一的帝国而是建立了各自独立的城邦制度是其优势,而又以其没有建立统一的帝国论证腓尼基人对文明贡献不大。这种论证逻辑显然是双重标准,无法自圆其说。

第三,"没有稳定的领土",这也不影响一个民族的历史性作用。地中海东岸是人类文明最早出现的地方,不同的民族都在这个地方演绎兴衰的历史剧目,苏美尔人、赫梯人、亚述人、波斯人等等,你来我往,没有稳定的领土是历史常态,而到处建立殖民点也正是地中海文明的一个特征,希腊人在小亚细亚、意大利半岛南部也建立了许多殖民点。实际上,正如李永斌自己指出的,在这方面腓尼基人与希腊人有共同性且影响了希腊人。"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在地中海的殖民活动,影响了本土定居点的发展过程,加快了它们城市化的转变过程。"他还援引西方学者的看法: "总体来说,腓尼基人的殖民地更具有城市的雏形,有神灵的圣所,有更为密集的建筑,而希腊殖民地则是在有一定规划的街道之间混有房屋建筑和耕地。……西地中海的希腊殖民地,很多来自希腊本土那些尚未城市化的地区,他们在殖民过程中学习借鉴了腓尼基人的城市规划和建筑特征,促进了希腊殖民地的城市化,而希腊殖民地的城市化又通过殖

① 李永斌:《希腊与东方: 文明交流与互鉴》,北京: 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48页。李永斌的《希腊与东方》写得很好,观点很有见地,我从中学到很多。但是,他某些论断仍然值得推敲和斟酌,我觉得他可能在某些方面仍然没有全然摆脱西方叙事结构的羁绊,同时也反映了西方历史观和叙事结构对当今世界人文社会科学复杂而深刻影响。

② 亨利·法兰克弗特等:《人类思想发展史: 关于古代近东思辨思想的讨论》,郭丹彤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154页。

民者自身的纽带影响了希腊本土的城市化。”①另外，在历史上，犹太人很长时间内没有自己的国土和国家，这也没有影响到大家对犹太人对人类文明发展史贡献的看法。

第四，“没有足够的族群认同感”，这个理由恐怕也不一定符合历史实际。历史上，腓尼基人曾经长期与希腊人进行战争，争夺西西里岛的控制权，后来又与罗马争夺地中海的制海权。源于腓尼基人的迦太基也曾经一度构建了在地中海可以与罗马帝国分庭抗礼的海上霸权，多次击败不可一世的罗马军团。显然，没有一定的民族认同感，创造这样的历史辉煌是难以想象的。在战场上是很容易检验民族认同感的，缺乏认同感的民族就是乌合之众，很容易被击败。当然，认同感有程度差别，认同感弱的民族的确容易在竞争中失败，不过历史记载往往进一步强化胜利者的叙事观，希腊罗马人肯定会设法压制或遮蔽腓尼基人的民族认同感和历史成就的叙述，因此我们不能进一步压低战败者的历史作用。

第五，说腓尼基人在文化上“缺少创造性”，恐怕也是有问题的，是值得质疑和讨论的。众所周知，尽管腓尼基人与希腊人说着不同的语言，但是希腊字母则是源自学习腓尼基人。希腊人原来是另外一种书写方式，而借用腓尼基字母让希腊甚至整个欧洲的语言文字产生了方向性改变。毋庸置疑，发明字母本身就是文化创造力的一种重要的体现。过去中国就曾经说“仓颉造字鬼神泣”，因为文字的发明使人类借助符号蕴含的“意义”，创造了一个有别于客观存在的精神世界，并且让这种意义世界可以在代际之间传递，让人类进入了文化进化的快车道。人类已经有上百万年的历史，但真正加速发展的文明史则是文字发明后的效应。再者，我们都知道航海对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而腓尼基人则是公认的航海民族。如果航海对人类文明史产生过重大影响，航海史专家都承认：“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证实，腓尼基人是铁器时代第一批使其贸易网络跨越地中海的商人。”而在荷马史诗中，希腊人是“怀着嫉妒和不信任的心理”看待腓尼基人。② 实际上，在对领先者的疑虑中，希腊人就逐渐从腓尼基人那里学习了，这有点类似现代社会视野相对封闭的农村人看待城市人的心态。突尼斯学者奥纳拉写道：“在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文献中，作者会不加掩饰地将战舰的发明归功于腓尼基海军。”另外，在希腊和拉丁语文献中，“对迦太基所制定的宪法不吝赞美之词”，其中包括著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③ 希腊哲学是希腊人对人类文明最独特的贡献，然而希腊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生活在亚洲的米利都，甚至第欧根尼·拉尔修在《著名哲学家》中提到：“根据柏拉图的说法”，泰勒斯“是卡德谟和阿格诺罗嫡系的腓尼基人特利德家族的一员……被接受为米利都的公民”，而且“据潘斐勒说，他向埃及人学习过几何学”④。所有这些希腊人自己的记载，都说明，在历史上希腊人曾经受惠于腓尼基人的引导。

显然，我认为，不仅腓尼基人曾经对希腊文化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而且从当时的文明发展的时空态势来看，整个西亚、北非等文化都应该是希腊人的老师。至于后来希腊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希腊人又反过来影响西亚、北非并形成“希腊化时期”，那也不应该抹去其之前曾经作为东方文化学生的历史。当然，这里的学习不是完全接受“他者”的文化，而是受到他者文化的启迪而构建自己类似的文化样式。正像恩格斯说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是穿着古人的衣服演现代戏，有些时候，也许希腊人是穿着看似别人的衣服唱自己的戏，甚至衣服需要合身也要加以改造才可以。但别人的影响有时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中国的弦类音乐受西域影响，因此中国人尽管对弦类乐器进行了许多改造，但不妨碍将其称之为“胡琴”，从而认可这种外来影响，进而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另外，在世界历史上不乏后来者居上的例子。譬如，中国曾经长期领先于日本，可以说是日本的老师，但在近代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却落在日本后边，许多中国人要去日本学习，这时的日本人又成为中国人的老师。又如，西欧在所

① 李永斌：《希腊与东方：文明交流与互鉴》，第 74、75 页。

② 林肯·佩恩：《海洋与文明》，陈建军、罗燚英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84、89 页。

③ 萨米尔·奥纳拉：《看见迦太基》，郑珊珊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47、89 页。

④ 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1、2 页。

谓“文艺复兴”过程中学习了希腊罗马古代文明,可以说希腊罗马是西欧、北欧的老师,但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却大大超越了希腊罗马,直到目前,整体而言西欧、北欧也要比南欧更发达。再如,美国是在欧洲基础上发展的,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却远远领先于欧洲,以至于欧洲本身也面临所谓“美国化”的问题。另外,我们应该知道,文明交流从来都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复杂的双向影响。无论是在希腊的东方化时期还是后来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化时期,文化交流本质上都是双方之间的交流互鉴,只不过是每个时期都有某种强势文明或文化主导着这种交流互鉴的过程。

## 三

同样地,在论证了古希腊与东方文化的密切联系之后,仍然断定希腊人“发展出与东方文明特征迥异的古典文明”①。这是似是而非的,无疑反映了深入骨髓的西方文明观,西方的叙事结构不是轻易就可以摆脱的。不同的文明有差异,这是事实。但是,本质上迥异则是问题。西方这种将“东-西”截然对立的文明观,就是萨义德所批评的东方主义,也是西方中心主义所依托的逻辑支点。就如萨义德指出的,“我们永远不应以为,东方学的结构仅仅是一种谎言或神话的结构,一旦真相大白,就会烟消云散。”实际上,作为世界观方法论的东方学之“权力会偷偷地潜入、蛰伏于哪怕是最深澳的研究中”②。东-西二元分野的文明观最值得警惕,一不小心就可能跌入其陷阱。如有学者认为,尽管有希腊的东方化时期,“但是在诸多领域,希腊人仍然保持了本土的独特性,如史学、抒情诗、舞台剧等。东方社会的许多独特事物也没有在希腊找到对应之物,如巨大的宫殿、强大的王权、连续性的王朝等”③。且不说东方社会如中国也有累积丰厚的史学、多姿多态的抒情诗等,而且希腊的许多经典和历史反而是东方的阿拉伯人保存了下来,后来又被欧洲人发现的,就说希腊社会到马其顿崛起也建立了强大的王权,似乎与波斯帝国没有什么两样,而希腊化时期的托勒密、塞琉古等王朝也具有连续性。如果我们将在亚历山大里亚的欧几里得开创的几何学归功于希腊,那就不应该认为托勒密、塞琉古等王朝不属于希腊。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不能选择性取舍,选择性取舍就属于“双标”了。而双标就是西方中心主义要达到的效应。再次,为什么只是说“与东方文明特征迥异”,而不说古希腊与当时的西欧文明特征迥异,实际上那个时候它们之间的差异更大,西欧人那时才真正处于策勒所说的“野蛮、半野蛮”状态。另外,从“巨大的宫殿、强大的王权、连续性的王朝”看,法国的凡尔赛宫、路易十四的王权以及哈布斯堡、波旁、霍亨佐伦、罗曼诺夫等欧洲诸王朝的连续性不亚于亚洲。

我认为,希腊罗马创造的古典文明是地中海文明的组成部分,当罗马帝国构建了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时,这个文明越来越体现的是地中海周围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各民族文明都有独特性,但更是具有人类文明的共同性。越是有交往机会的民族,他们的文化共同性就越多。希腊文字和希腊哲学最早都是在爱奥尼亚产生的,这显然不是偶然的,这不仅是因为具有冒险精神的人才离开家乡去他乡殖民,而且也是因为地处地中海东岸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因地理毗邻,就有更多机会——交往、冲突甚至战争——接触腓尼基文化。柏拉图承认希腊学习其他文明的成果,当然又说希腊人学习之后做得更加完美。是的,希腊人绝不是西亚北非文明的被动接受者,正如后来的西欧人也不是希腊罗马古典文明的被动接受者。无论如何,希腊是在与东方文明互动过程中创造了辉煌,而文明在这种交流互鉴中不断进步是普遍规律,每个民族都是自身文化发展的主体,但具有创造性的文化主体也往往是有更多交往实践的主体。历史已经证明,有更多交流的机会会促进文化的活力和创造力。人类的文化创造、文明发展往往不是走

---

① 李永斌:《希腊与东方: 文明交流与互鉴》,第 141 页。

②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8 页、“2003 年版序言”第 16 页。

③ 李永斌:《希腊与东方: 文明交流与互鉴》,第 141 页。

直线的，在充满进取心和活力的时期往往会使社会财富、器物发明、知识水平大大推进一步，但是随着生活的安逸或内部矛盾的积累，创新、创造的冲动往往逐渐被压制，社会活力逐渐窒息，这个时候创造力可能会在这个文明体的边缘、外围逐渐积累成形。因此，世界历史似乎呈现为不同民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起带头作用的现象，黑格尔和恩格斯都说过这个现象。但是，恩格斯与黑格尔的区别在于，他是历史主义地理解各民族的发展，而不像黑格尔那样认为每个民族似乎只是世界历史发展其中一个僵死的环节与片段。如黑格尔认为，中国作为世界历史的绝对起点，其“整个理智的活动是停滞不前的”，“中国人……两千年以前在各方面就已经达到和现在一样的水平”①。实际上，尽管世界历史的发展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但是在伴随发展的过程中，边缘的民族不是没有创造力，而只是其历史的能量或势能不能代表这个时代，而代表那个时代的往往是当时占优势地位的民族。

众所周知，在希腊文明崛起之前，在亚洲的两河流域、黎凡特地区、小亚细亚区域以及北非的埃及，人类文明已经有了长时期的发展、演化，知识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在那个时期，欧亚非交界处的文明中心就是围绕地中海展开的，希腊文明就是在与其“东方”的邻居的交往、学习和借鉴中逐渐成形、升华、飞跃的。② 希腊最初是两河流域和埃及文明的“外围”或“边缘”，它在与中心的交往中逐渐发展并且在知识和文化上超越了原来的中心，成为地中海文明圈的新中心。我认为，地中海文明大体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希腊等欧洲部分受所谓近东影响的时代，即希腊的东方化时期；二是亚历山大东征之后掀起的地中海地区希腊化时期；三是罗马帝国建立之后，地中海地区融合发展时期。

西方学者断定，西欧崛起是突破中世纪黑暗时代的乌云，通过“东与西”的二元对立拉宽古典文明与地中海东方文明之间的缝隙，通过所谓创新发现或“文艺复兴”的想象，抹平古代文明与阿尔卑斯山以北欧洲的沟壑，构建起西方重新延续古希腊罗马古代文明衣钵的话语系统，这套话术构建了从希腊罗马到西欧文明连续性以及欧洲独特性的叙事结构。实际上，当时还根本不存在欧洲特性，历史本身是生成性的，是人们的实际历史活动所形塑的，我们不能本质主义地理解历史过程。整体而言，欧洲当时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文化特征。譬如，麦克尼尔就指出：“欧洲文化的不稳定性也没有由于基督教风格的文明的建立而结束，因为近现代西方文化社会与 3 世纪到 6 世纪的基督教世界的差异，至少在程度上不下于基督教文明与它的异教前身的差异。非常的不稳定源自一个到另一个极端之间的剧烈摆动，这实际上可能是欧洲风格的文明最突出最有决定性的特征。”另外，这时“欧洲文明明显不如亚洲文明社会稳定”。继希腊文明广泛扩张和罗马帝国灭亡之后，“在欧洲则是文明的急剧倒退。到 8 世纪和 9 世纪初，文明的社会结构在地域上没有超出作为文明发源地的爱琴海摇篮”③。麦克尼尔的论述比较符合历史，反映欧洲处在其后来文化创造性躁动的前夜。而把西欧与古典文明直接联系起来寻找欧洲特性的这种叙事结构，一方面是掩盖了西方

---

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 1 卷，贺麟、王太庆译，第 8—9 页。

② 如荷兰学者亨利·法兰克弗特指出：“在人类文明史的长河中，埃及文明中那种体现登峰造极技术水平的石制建筑的产生，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现象。”“……他们认为自己绝对有能力创造一项项辉煌成就，而这种物质上的胜利只是追求美好生活的第一个目标。”实际上，埃及人的成就也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经历数代人漫长的探索与积累。另外，法兰克弗特显然认为埃及文明的高峰是物质文化，尽管他也探讨了埃及社会内部伦理道德观念的丰富与复杂性。但他在回答“古代埃及为后来的哲学、伦理学及世界意识的延续和发展做出过贡献吗”的问题时断言：“不，它并不像巴比伦尼亚的科学、希伯来的神学、希腊或者中国的理性主义那样直接影响这些具体指定的领域。……仅凭初期的辉煌，埃及不可能兼顾所有的领域同步发展。”“但是，埃及还是在它的邻国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希伯来人和希腊人都深深地为这一庞大国家的实力和稳固所折服。……在埃及人超越时代的价值观的鼓舞下，希伯来人和希腊人的哲学观、伦理观也都相应地得到了发展。……埃及的文化过早地达到了智力和精神上的巅峰，以致哲学思想没能发展成为文化遗产而流传后世。”（亨利·法兰克弗特等：《人类思想发展史：关于古代近东思辨思想的讨论》，郭丹彤译，第 97、98、119、119—120 页）问题是，当人类文明进入下一个阶段时，埃及已经落后于其他民族了，甚至已经被其他民族所征服。

③ 威廉·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孙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2018 年版，第 421、545 页。

在古代与其他文明相比之下的过于粗陋,另一方面是概括了其近代以来的文化兴起与成功,并且由此来证明西方的独特性和优越性,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二元对立确立为一种历史观和方法论,从而将西方文明视为具有普世性的文明。但是,我们必须知道这个叙事是近代的或"文艺复兴"以来的产物。

在古典时期,世界历史的真实面貌与现在西方所叙述的是迥然不同的。也就是说,希腊罗马文明更多地是环地中海文明的组成部分,希腊罗马古典文明与地中海其他文明的共同性要大于与西欧、北欧的共同性。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西蒙 · 普莱斯、彼得 · 索恩曼认识到的,"公元前第一千年的头几个世纪,中欧、地中海西部、爱琴海地区和黎凡特这几个地区非常不同,最明显的差异不是东西之间的差异,而是这一时期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和以南地区之间的差异。在公元前 800 年前后地中海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无论是腓尼基、塞浦路斯、希腊本土、撒丁岛还是意大利半岛北部,都可以看到经济和政治腾飞的迹象。所有这些非常不同的社会都在经历大规模的人口增长、快速的技术进步和复杂国家的形成。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在中欧以及其他地方,都看不到这类发展的迹象。"可见,在西亚北非的影响下,希腊罗马文明得以崛起,这显然是"地中海城邦的时代","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决定性地领先于欧洲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地区。"①当然,西欧在地理上与作为南欧组成部分的希腊、罗马当然也有文化互动的便利,而且因西欧文明兴起较晚因而在文化上受到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响,在语言文字、宗教、艺术、思想等方面有许多共同性,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因这种后来历史所塑造的共同性,排斥、遮蔽希腊罗马文明与地中海文明之间的关联性和共同性。

总而言之,世界上的各种文明,在本质上都是地方性的或特殊性的,不存在作为唯一真理性的与"多"对峙的"一"。西方虚构"欧洲特性"的目的,就是把欧洲文明看作是真正的文明,而将世界其他文明看作是作为"多"的特殊文明。对于西方而言,其他文明都不是学习的对象,而仅仅是文明的"参照物"。这种文明观就是西方中心论,即把世界其他地方的文明都看作是"未开化"或"半文明"状态。

# Transcending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Western-Centric Theory: Reassessing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the Phoenicians

Han Zhen
( *School of Philosoph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the Western-centric theory posits a binary oppositio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ast ( non-Western societies) and the West, framing the former as the realm of relativity, particularity and contingency — the "many" — while positioning the latter as the domain of absolutism, universality and necessity — the "one." The extended sense from this binary opposition is that the West is civilized while the East or the non-Western world is barbarous or semi-barbarous, in other words, uncivilized or semi-civilized. So, this dichotomy inherently deems Western civilization as the epitome of progress, reducing non-Western societies to mere references or passive counterparts devoid of agency in shaping universal paradigms. Such a framework perpetuates the myth that civilizations outside Europe exist solely as foils to Western hegemony rather than as autonomous contributors to global heritage. By critically examining academic evaluations of non-European peoples such as the Phoenicians, this article exposes how unconscious adherence to Western-centric logic continues to reproduce hierarchical and exclusionary historical narratives. Specifically, it contends that dismissing the Phoenicians as unqualified to be regarded as mentors of the Ancient Greeks reflects a failure to transcend this epistemological framework.

**Key words**: classical civilization; Phoenician; ancient Greek; Mediterranean civilization;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责任编辑　刘曙光)

① 西蒙•普莱斯、彼得 • 索恩曼:《古典欧洲的诞生;从特洛伊到奥古斯丁》,马亮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2019 年版,第 77 页。